

# 古代中国的政治霸权论

——兼评《战国策》的霸权思想及启示》

王日华

在中国古代国际政治与外交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霸权思想,《战国策》一书中就留下了大量争霸的言论与史实。阎学通和黄宇兴的《战国策》的霸权思想及启示》(以下简称《阎文》)一文就详细归纳了《战国策》中的霸权思想。《阎文》通过研读《战国策》,总结了霸权的实力基础、规范对霸权的作用、争霸的基本战略,并将其与当代西方霸权理论进行了比较,提出了中国古代以政治实力为核心、以贤能政治为保障、强调规范对霸权影响以及相应的争霸战略的霸权思想,从而初步提炼出了一幅政治霸权论的画卷。本文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归纳和整理古代中国尤其是先秦时期的政治霸权论。

## 一、殊途同“霸”:概念的界定

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一般都是从战争能力、军事实力或者经济实力等物

---

阎学通、黄宇兴:《战国策》的霸权思想及启示》,《国际政治科学》2008年第4期,第79—102页。

---

《国际政治科学》2009/3(总第19期),第112—124页。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质力量的角度来定义霸权国。霸权国也被写作主导国 (dominant power)、最强国 (predominant power/preminent power) 或领导国 (leading power/leadership/world leadership)。米尔斯海默 (John Mearsheimer) 认为,“霸权是指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统治体系中所有其他国家。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能具有能承受起与之进行重大战争的资本。”帕赫 (Robert Pahre) 将国家资源和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上所占份额看作霸权国的基本指标。戈登斯坦 (Joshua S. Goldstein) 认为霸权国就是拥有最强大的军事、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国家。罗伯特·吉尔平 (Robert T. Gilpin) 认为,霸权国就是国际体系中控制或者统治该体系内比较弱小国家的国家。罗伯特·基欧汉 (Robert O. Keohane) 和约瑟夫·奈 (Joseph S. Nye) 认为,霸权国就是指“一个国家是足够强大的,能够维持管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而且它愿意这样做”。他们明确表示,在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时代,军事力量是次要的,经济的重要性超过了军事。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指出,国际体系中的霸权是指,在持续对峙的所谓大国中形势是如此的不平衡,以至于某一个大国成为实际上的第一元首,这个大国大体上可以把它自己的规则和意愿,强加于国际体系中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甚至是文化领域,至少是在这些领域中拥有实质上的否决权。

古代汉语中的霸权国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霸权国在内涵上高度接近。在古代汉语中,“霸通伯”,二者是同一个词,指的是“古代诸侯之长”。也就是说,霸权国是诸侯国之中地位最高,排列在第一次序的国家,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代的霸权国与沃勒斯坦所指的“第一元首”国家或者说“首席元老”

---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2001), p. 2

Robert Pahre, *Leading Questions: How Hegemony Affects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9), p. 4

Joshua S. Goldstein, *Long Cycles: Prosperity and War in the Modern Ag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25.

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武军、杜建平、松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第 29页。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 3版)(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第 45页。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Politics of the World—economy: The States, the Movements, and The Civiliz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38.

王力主编:《王力古汉语字典》,北京,中华书局 2000年版,第 1619页。

国家是一致的。在先秦典籍中,霸权国一般直接表述为“霸”,但常常与“大国”互用,这一点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相同,即二者都认为霸权国首先是大国,或者说是大国中的一种。中国古代习惯上把霸权国称为“霸主”,即“春秋时代势力最大并取得首领地位的诸侯”,这种思想与米尔斯海默的观点高度一致。

然而,从古到今,汉语中的霸权及其相关概念的内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西周时期,“五国以为属,属有长。十国以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以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以为州,州有伯”。霸权国作为“诸侯之长”是一种地位和荣誉的象征,霸权国的地位来源于王权国家的封赐。春秋以后,“天子衰,诸侯兴故曰霸。霸,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也就是说,依靠强大实力而获得霸权国地位的国家称为“霸”,尽管本质一样,但是来源有所不同,故用“霸”代替“伯”。孟子首先把“霸道”与“王道”作为两种不同的政治路线并列,并由此形成了“王霸之争”。在当代汉语中,“霸主”指的是“在某一领域或地区最有声威、势力的人或集团”;而“霸”、“霸权主义”和“霸权主义国家”开始与“蛮横、控制、压迫、侵略”等贬义内涵紧密联系在一起。《阎文》和本文都是从古代汉语的涵义上使用“霸权”和“霸权国”的概念,并将之视为一个中性词,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代的霸权思想与当代西方霸权理论才具有可比性。

## 二、政治霸权的基本结构

霸权是综合国力竞争的结果,但是不同的权力要素在霸权中所处的地位是不一样的。西方霸权理论对核心权力要素的偏重主要可以分为四类:(1) 地缘霸权论。马汉(Alfred T. Mahan)认为海权是世界霸权的核心要素。麦金德(Halfard J. Mackinder)则表示,陆权是世界霸权的核心要素,他提出了著名的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年版,第23页。

李学勤主编:《礼记正义》(上),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第348页。

同上书,第699页。

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第198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第22—23页。

A. T. Mahan,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Boston: Little & Brown, 1890).

世界霸权三段论,即“谁统治了东欧谁便控制了心脏地带(heartland);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了世界岛(World-Island);谁统治了世界岛谁便控制了世界。”朱里奥·杜黑(Giulio Douhet)还发展出了空权论,强调制空权在确立世界霸权中的核心作用;(2)军事霸权论。米尔斯海默认为军事实力尤其是陆军实力及其所体现出来的战争能力是霸权的核心要素;(3)经济霸权论。沃勒斯坦、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等人坚持经济实力以及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是霸权的核心要素;(4)军事—经济霸权论。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表示,相互联系着的财富和权力或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是世界霸权的核心要素。

《战国策》是一本记叙了战国时期各种国际政治与外交思想流派相互争论的著作,由此也保存了先秦时期各个流派的霸权思想。如同西方霸权理论一样,“《战国策》中的战略家们,普遍认为霸权是建立在综合国力基础上的,而且认为综合国力是由不同的国际要素构成的。在他们所讨论的国力要素中,经常提到的实力要素是政治、军事、经济和地理这四要素。”与西方霸权理论不同的是,中国古代霸权思想中,存在着将政治实力作为霸权核心要素的流派,并由此奠定了政治霸权论的基础。

政治霸权论认为霸权的核心要素是政治实力,而政治实力的中心则是政府的治国能力和影响力。根据《阎文》的归纳,《战国策》中的霸权论认为“政治实力是霸权实力的核心”,而且在军事实力和地理因素与政治实力的争论中,更加强调政治实力的重要性。《阎文》还进一步指出,“君主和大臣们政治品德

---

Halford J. Mackinder,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Reconstruction*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1942), p. 106.

Giulio Douhet, *Diario critico di Guerra* (Torino: G. B. Paravia, 1921).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3rd edition) (New York: Longman, 2001);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Immanuel Wallerstein, *Merchantism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1600—1750*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0).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London: Unwin Hyman, 1988).

阎学通、黄宇兴:《战国策中的霸权思想及启示》,第83页。

同上,第84页。

和领导力被视为是霸权政治实力的主要构成要素”。政治实力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政府的领导力或者说治国能力;二是政府主要官员的品德和修养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影响力。

政治霸权论认为,政府的治国能力,尤其是国君和主要大臣的治理能力决定了霸权的命运。墨子表示,“齐桓染于管仲、鲍叔,晋文染于舅犯、高偃,楚庄染于孙叔、沈尹,吴阖闾染于伍员、文义,越勾践染于范蠡、大夫种。此五君者所染当,故霸诸侯,功名传于后世”。鲍叔牙推荐管仲为相时就表示,“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管仲相齐后果然帮助齐国建立了霸权,孔子也认为,“管仲相桓公,霸诸侯,“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相反,秦国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均首屈一指,但是,“秦当伯不伯,究其原因,其中之一就在于“谋臣之拙也”。因此,政治霸权论倡导“贤君明相”,坚信“夫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

政治霸权论强调道义影响力是首要作用。道义影响力来源于君主及其主要大臣的品德和修养以及由此制定的政策。德行是盟主或者说霸主的基本要求,“大国制义,以为盟主,“无德,何以主盟?”齐桓公“以赡贫穷,禄贤能,“审吾疆场,反其侵地,正其封界,毋受其货财,<sup>⑩</sup>于是成就了齐国的霸权。晋文公“修政,施惠百姓,<sup>⑪</sup>于是成就了晋国的霸权。秦国国富兵强,但是由于秦穆公品德低下,秦国“法令至行”,“刻深寡恩,特以强服之耳,<sup>⑫</sup>因此,“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sup>⑬</sup>霸权政治论认为,诚信是道义影响力的重要组成

---

阎学通、黄宇兴:《战国策中的霸权思想及启示》,第86页。

《墨子·所染》。

《史记·齐太公世家》。

《论语·宪问》。

《战国策·秦策一·张仪说秦王》。

《战国策·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

《左传·成公八年》。

同上。

《史记·齐太公世家》。

⑩ 《管子·小匡》。

⑪ 《史记·晋世家》。

⑫ 《战国策·秦策一·卫鞅忘魏入秦》。

⑬ 《史记·秦本纪》。

部分。“信以行义，义以成命。”荀子表示，“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疆殆中国，无它故也，略信也。是所谓信立而霸也。”当然，政治霸权论并不排斥物质性权力的必要性。古代中国的国际政治思想认为，物质性实力与道义性影响力构成了权力的两个基本方面，“晋所以霸，师武、臣力也。”孟子也表示，“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因此，“一个国家要维持其霸主地位，必须德、威、信并重。”

政治影响力的形成则是一个依次递进的历程。古代中国的国际政治思想和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一样，都主张采用层次分析法来观察世界、分析世界并构建世界政治的理论。不同的是，中国古代国际政治思想提出了四个层次的分析方法，即个人、家庭、国家和世界，这四个层次之间存在着递进式的影响与因果关系，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或者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不同程度的物质性实力以及相应层次的道义性影响力，决定了国际政治体系中的权力层次。春秋时期，齐国在取得了霸权之后，齐桓公希望进一步向王权层次发展，于是对管仲说“寡人欲霸，以二三人之功，既得霸矣。今吾有欲王，其可乎”。管仲等人婉转地告诉齐桓公，由于桓公本人的品德还没有达到王的层次，因此齐国不可能实现王权，齐桓公也就打消了追求王权的想法而满足于霸权。

由此可见，在霸权的构成要素及其先后次序的排列上，中西方最大的区别在于对道义性影响力及其作用的重视程度。西方地缘政治理论在强调地理环境作为世界霸权的核心要素的同时，都认为政治实力虽然也是综合国力或者说地缘政治实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政治实力的重要性要远远低于地理环境。军事霸权论、经济霸权论和军事—经济霸权论都是如此。而古代中国的霸权思想则认为，以道义性影响力为核心的政治实力是权力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

---

《左传·成公八年》。

《荀子·王霸》。

《左传·宣公十二年》。

《孟子·公孙丑上》。

孙家洲：《天子·霸主·诸侯：春秋霸政研究》，《贵州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第10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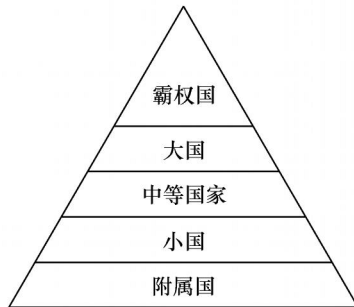
李学勤主编：《礼记正义》（下），第1592页。

《管子·小问》。

分,同时存在于各个不同的权力层次之中,而且处于优先地位。但是相比较而言,一般来说,霸权倾向于更多地要求物质性权力,而王权则对道义性影响力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此外,中西方霸权理论的区别还在于对层次间因果进程的不同理解。尽管中西方都采用了层次分析法,但是西方霸权理论侧重于强调相对权力的优先性和国际体系结构对霸权的影响作用,是一种由外到内的因果进程;而古代中国的霸权思想则更加重视霸权对国际体系结构的决定性作用,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因果进程。

### 三、国际体系中的政治霸权

在西方霸权理论中,霸权位于国际政治权力结构的最顶端,是国际政治中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国际政治权力结构中,国家根据权力的大小而呈现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如下图)。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还根据霸权数目的多少,把国际体系定义为单极、两极和多极三种结构。



图表来源: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2nd ed) (New York: Knopf, 1968), p. 365.

在中国古代霸权思想中,霸权并不是体系结构中最高层次的权力。《管子》一书中把大国权力从高到低依次分为四个层次:皇权、帝权、王权和霸权。《荀子》一书中则主要区分为王权和霸权两个权力层次。皇权和帝权均属于

---

《管子·兵法》。  
《荀子·王霸》。

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时期的国家权力或者说一种理想的权力层次,在现实中不可能实现。因此,包括《战国策》在内的中国古代典籍一般都承认大国权力主要有王权和霸权之分。王权指的是在“天下一统”或者说在所知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个统一国家情况下统治世界的权力,是现实世界政治中第一层次的权力。霸权则是指在一个分裂的世界范围内能够影响甚至是控制其他国家的权力,是低于王权的第二层次的权力。也就是说,王权和霸权有“上下之分”。

因此,在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霸权就成为国家的主要战略目标甚至是终极目标。“每个国家压倒一切的目标是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权力”,然而,大国不止是为了争当大国中的强中之强,“它们的最终目标是成为霸主,即体系中唯一的大国。”但是在中国古代国际政治思想中,霸权并非国家的最终理想目标。《閩文》并没有区分《战国策》中的霸权和王权,也没有区别战国初期和末期国家战略目标的转移。在战国初期,霸权是各国竞争的核心,而在战国后期,秦国的战略目标已经不在于对霸气的满足,而是出于对王权的追求。

霸权与国际体系的稳定或者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霸权稳定论强调霸权与国际体系稳定之间的因果关系。新自由主义则强调霸权对促进国际机制、规范的建立及其国际合作的影响。霸权周期论则强调霸权兴衰和霸权转移与体系变迁之间互为因果。金德尔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提出:要使世界经济处于稳定状态,就必须有起稳定作用的国家,而且只能有一个这样的国家。罗伯特·基欧汉则进一步指出,霸权制定规则,然后鼓励其他成员遵从,由此实现了国际合作。霸权周期论则认为,霸权的兴衰导致了霸权转移,霸权转移在引发体系战争的同时,也会由于体系战争

---

秦朝以后的历代统一王朝都认为把自己所知世界认定为全部的世界,他们也自认为其所建立的帝国就实现了皇权和帝权的目标。

《荀子·王霸》;《荀子·君道》。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 2

查尔斯·金德尔伯格:《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宋承先、洪文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365页。

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河、信强、何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1页。



的结果而完成霸权的更替,从而引发了体系的变迁。

古代中国的霸权思想同样重视霸权与国际规范以及国际体系之间的关系。《阎文》总结了《战国策》一书中关于“规范与霸权合法性的关系,遵守规范与使用武力的关系,以及建立新规范与遵守旧规范的关系”。根据《阎文》的归纳,《战国策》中的霸权思想认为,规范为霸权提供了合法性的基础,也为霸权行使武力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建立规范对霸权来说,既是必要的但同时也具有很大的风险,新规范能否得到国际认同直接决定了霸权的合法性基础。晋国称霸,“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

霸权通过建立一系列国际规范并主导以此规范为中心的国际组织来体现其权力,反过来,国际规范与国际机制又会内化为霸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即机制性霸权。因此,考克斯(Robert W. Cox)提出了霸权的三要素:“物质权力的分配格局、世界秩序的主导集体概念(包括一定的规范)、一组以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方式治理世界的制度”。古代中国霸权思想主要集中于遵守过去的甚至是古代的王权留下的国际规范和机制,而对于确立新的规范存在疑虑。政治霸权论认为,遵守乃至恢复旧有王权的国际规范和机制是道义性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内容。然而,要想遵守、维护或者恢复旧有的规范和机制,就必需创立新的以霸权为主导的规范和机制。但是,新规范与机制的建立在于恢复、维护或者遵守旧有规范与机制同时,也就形成了对旧有规范的消解。于是,政治霸权论就陷入了一个两难的悖论。

---

George Modelski,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Hampshire and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7); George Modelski, ed., *Exploring Long Cycles* (Boulder: L. Rienner Publishers, 1987); Joshua S. Goldstein, *Long Cycles: Prosperity and War in the Modern Age*;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Immanuel Wallerstein, *Mercantilism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1600—1750*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0).

阎学通、黄宇兴:《战国策中的霸权思想及启示》,第89页。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罗伯特·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郭树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6页。

## 四、政治霸权与对外战略

政治霸权论倡导同盟战略。荀子表示,“友诸侯者霸”。政治霸权论认为政治影响力最终能否得到国际认同是霸权确立的基本标志,而霸权的国际认同取决于三个因素:第一是和体系中的大多数国家建立盟友关系;第二是与体系中的主要大国成为盟友;第三是能够主持盟会,即成为盟主。“春秋时,大国运用会盟争霸,并以当上盟主作为称霸的标志”。《阎文》还进一步指出,“如果这同盟是体系内最强大的同盟,其盟主就是最大的霸权,如果是唯一同盟,其盟主就是该体系内的唯一霸权”。因此,政治霸权论认为,要想成为霸主,就必需首先成为盟主。“会盟可以确立公认的霸主地位”。“从春秋历史而论,凡是成霸业的诸侯,没有一个不是成功地实施了会盟战略的。”据统计,仅《春秋》和《左传》所记载的盟会有 246 次。齐桓公主持了鄆地盟会后,“齐始霸也。”齐国霸权鼎盛时期,齐桓公在位的 43 年间共参加了 39 次盟会,而齐桓公亲自参加的盟会就有 21 次。晋文公连续主持了践土会盟和翟泉会盟,“晋侯始霸”;吴国召集黄池会盟而“霸中国”,<sup>⑩</sup>越国通过徐州会盟而“号称霸王”。<sup>⑪</sup>相反,秦国国富兵强,开地千里,但是由于未能召集主持盟会而只能“霸西戎”,<sup>⑫</sup>春秋初期,“时无霸主”,<sup>⑬</sup>郑国作为当时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也只能称

《荀子·王制》。

张全民:《试论春秋会盟的历史作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6期,第46页。

阎学通、黄宇兴:《战国策中的霸权思想及启示》,第95页。

宋立恒:《论会盟在春秋争霸中的特殊功能》,《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第91页。

何平立:《略论春秋时期会盟、争霸战争与战争观》,《军事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第109页。

徐杰令:《春秋邦交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5页。

《左传·庄公十五年》。

何平立:《略论春秋时期会盟、争霸战争与战争观》,第109页。

李学勤主编:《春秋左传正义》(上),第460页。

⑩ 《史记·吴太伯世家》。

⑪ 《史记·越王句践世家》。

⑫ 《史记·秦本纪》。

⑬ 李学勤主编:《春秋左传正义》(上),第207页。

为“小霸”，“这里面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他未能在诸侯会盟方面有所建树。”政治霸权论认为，盟会除了可以确认霸权之外，还有两个重要的政治功能：一是通过盟会来控制盟国，防止盟国出现离心倾向；二是通过盟会来制定国际规范，从而把霸权国的意志变成国际共识，进而实现制度性霸权。当然，春秋时期的会盟更加强调多边外交，而战国时期的同盟多侧重双边外交。于是，“春秋末、战国初，盟会习俗一度衰落，战国中、晚期，会盟向合纵、连横演进。”在春秋战国时期，同盟战略不仅仅在于建立同盟和维持同盟，还在于通过同盟战略来瓦解敌对同盟。战国时期国家间同盟的次数非常多，但这些同盟也都是非常短暂的。在《战国策》中，除了如何建立同盟的思想之外，还包含着大量的如何瓦解对方同盟的思想。因此，先秦时期一般都把同盟战略作为权宜之计，却并不认为同盟具有持久的战略价值。

政治霸权论并不反对对外征服，但是主张后发制人的军事战略。相比较王权更加侧重道义影响力来吸引其他国家的臣服，政治霸权论更加侧重于通过军事打击来实行对外征服。但是政治霸权论又不同于强权政治的对外扩张，而是主张后发制人的军事打击。后发制人战略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指的是在外交战略失败的情况下，不得不实行军事行动；另一方面指的是在对方采取军事措施之后，再采取强有力的军事反击行动。后发制人战略可以最大程度上为霸权获得必要的道义影响力，“有而案兵而后起，寄怨而诛不直，微用兵而寄于义，则亡天下可跼足而须也。所以，“诚欲以伯王也为志，则战攻非所先。”在对外征服过程中，政治霸权论认为对人的征服比对土地的征服更加重要。对土地的控制只是实现了部分征服，而由此激发起对方的民族主义和复国主义将成为征服者最危险的敌人，只有通过道义影响来征服民心才能完成彻底的征服。因此，政治霸权论反对唯利是图、自私自利的强权式扩张和血腥的掠夺与侵略。

政治霸权论强调国际义务和责任。政治霸权论认为，国际规范必须得到全体国家的遵守，尤其是霸权国自己应该率先垂范，然后才是监督其他国家共同

---

李瑞兰：《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变迁》，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4年版，第 36页。

张二国：《先秦时期的会盟问题》，《史学集刊》1995年第 1期，第 18页。

《战国策·齐策五·苏秦说齐闵王》。

遵守。对于背弃国际集体认同的规范的国家,霸权国有权力也有义务来纠正。“所谓盟主,讨违命也。”在春秋时期,国际规范主要表现为维护周朝的礼制,因此,霸主带头遵守周礼并维护周礼的义务。“非礼,何以主盟。”霸权国有义务对中小国家提供安全保障,同时在饥荒等危机时刻提供经济援助。“恤大舍小,足以为盟主。”在春秋时期,盟主的责任包括“亲亲与大、赏共罚否”等。政治霸权论认为,霸权国履行国家义务的根本在于增强霸权国的道义影响力,而且只有一定的品德修养的君主和大臣才能担任。所以说,“盟主要有一定的义务,有与之相称的资格。”

### 五、结 论

古代中国的政治霸权论不同于西方的军事霸权论、经济霸权论和军事—经济霸权论,政治实力要素取代了西方霸权理论中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军事—经济实力要素,成为霸权中的核心要素。政治霸权论认为,国富兵强也是构成霸权实力的重要要素,但是其重要性不如政治实力。政治实力的中心是政府的治理能力和道义影响力,政府的治理能力突出表现为政府首脑及其主要官员的治国能力和道德素养,而道义影响力则表现为该国成功的政治经济模式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政治霸权论认为,霸权并不是国际政治中最高层次的权力,因此脱离了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而单纯依靠政治实力也不能获得霸权。

政治霸权论认为国内层次和国际层次是紧密相连的,国内层次对国际层次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政治霸权论主张通过建立一种新的政治体制模式来发展经济,通过建立一支高效的政府队伍来推动本国经济、军事实力的发展。政治霸权论强调内政优先,主张首先“要办好自己的事”,而不是直接挑战现有霸

---

《左传·昭公二十三年》。

《左传·襄公九年》。

《左传·昭公元年》。

《左传·昭公十三年》。

陈智勇:《试析春秋盟誓对春秋时人的影响及时人对盟誓与盟主的评价》,《中国历史文物》,2000年第2期,第23页。

权国的霸权地位。政治霸权论认为道义原则是霸权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国内通过提高政府领导人的素质和品德,在国际上履行维护国际规范的义务,承担向中小国家提供安全保障和经济援助的责任。政治霸权论是一种新的非对抗性的崛起模式。

www.cnki.net

## 作者简介

刘丰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讲师。2004、2006和2009年在南开大学分别获法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译有《亚洲金融危机的政治经济学》。电子邮箱: liufeng00@gmail.com

冯惠云 犹他州立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1994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获英语语言文学学士学位。2002和2005年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分别获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最新著作为 *Chinese Strategic 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Confucianism, Leadership and War*。电子邮件: huiyun\_feng@asu.edu

王一鸣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08级硕士生。200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法学学士学位。电子邮箱: holdself@hotmail.com

田野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1998、2001和2004年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法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著有《国际关系中的制度选择》。电子邮箱: tianye@ruc.edu.cn

王鹏 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2008级专门史研究生。电子信箱: greatbird1020@sina.com

郭莹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著有《中国社会史论》、《震荡与冲突: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潮和社会》等。电子信箱: guoyinghbdx@163.com

王日华 广东省委党校副教授。1999年在安徽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2004和2008年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分别获法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电子信箱: wangrihua@gmail.com

徐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2008年获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学位。编著有《王霸天下思想及启迪》(合编),译著有《战争与国家形成》。电子邮件: xuj@cass.org.cn

杨倩如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2009年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史学史与中国文化传统。电子邮件: shirley\_yqr@sohu.com

阎学通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主任/教授。1992年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博士学位。最新代表作为《王霸天下思想及启迪》(合编)、《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国际关系分析》。电子邮件: yanxt@mail.tsinghua.edu.cn